



陈旭拓迹艺术作品《鸿儒博商》

创新与升华 ——陈旭拓迹艺术作品《鸿儒博商》赏析

边素庭 岳霞红

陈旭的拓迹艺术作品《鸿儒博商》，是一卷融合历史与晋商文化精髓，凝聚学识成就和艺术匠心的大气之作。它以独一无二的视觉语言对晋商精神内核进行了一次学术重构。

首先看作品《鸿儒博商》的主题。“鸿儒”对应儒家学识，“博商”指商业成就，两者结合正是晋商“贾而好儒”的核心特质。

其一，“鸿儒”否定了“唯利是图”这一世俗对商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凸显史上晋商所追求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修养；

其二，“博商”突破了地域商帮概念，揭示了历史上以文化赋能商业扩张的普遍性；晋商构建的众多跨国商号则进一步印证了“博通四海”的大贾风范。

由此，作品主题将晋商群体从历史现象，升华为中华儒商精神的典范形态，从性质、结构、坐标等多个维度明确了晋商是儒家文明在商业领域实践形态的重要定位。从而使作品超越艺术范畴，成为重新解码中国商业文明的罗盘之一。这些斑驳的拓片不仅是历史的印痕，更是当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宣言：当商业植根于文明的深厚土壤，“义利”之上自有星辰大海。

深读《鸿儒博商》拓迹作品，其创新与升华的要点有四：

第一，这是历史材料的重生。作品《鸿儒博商》以近50块明清晋商大院楹联和字号牌匾的原始物证为基底，将散落的历史碎片，重新整合形成为长12米、高3米的巨幅长卷。这里面的每一块拓片都是晋商精神的实体印记，承载着商业智慧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第二，这是空间叙事的创新。作品《鸿儒博商》以“一街两行”的纵深透视感，错落有致的排布，构建出明清晋商繁华街市的立体空间感，引导观者一秒便可走入历史街巷，触摸晋商文化的沧桑肌理。这种构图不仅是对建筑场景的复刻，更是对晋商“商道”的隐喻——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与人文生态。其背景活字的虚化处理，前景街道的实景铺陈，共同构成了时间的叙事感和空间的纵深感。观者既见具象商街，亦感知无形文化脉络，暗合中国画“计白当黑”的辩证哲学。

第三，这是文化符号的象征。作品《鸿儒博商》上端以木活字为背景，象征晋商以儒家经典为精神根基。“木活字”作为古代知识传播的载体，暗喻晋商将文化内化为商业伦理（如诚信、仁厚）的源起。下端设计的“书山”街道，以木活字拓印为“山形”，呈现“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此处“山”既是勤学之径，亦是对晋商“行商如行山”的艰辛历程的致敬——商路如山路，唯勤可登顶。而上下端呼应结构，则让文化与商业实践通过透视空间融为一体，揭示晋商“儒为商魂”的本质——儒家思想滋养商业智慧，商业实践反哺文化传承。透过这样的陈设，充分展现出了晋商群体“鸿儒博商”的精神内核。“鸿儒”，指向晋商“贾而好儒”的特质，他们不仅是商人，更是深谙诗书、推崇礼义的儒者。木活字背景强调其以文化底蕴立身。“博商”，凸显晋商纵横四海、博通商道的格局。拓片中的商号匾额，是其商业帝国的缩影，而街景透视则暗示其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第四，这是儒商精神的喻示。作品《鸿儒博商》暗喻晋商成功的核心并非单纯逐利，而是以文化创新、商业创新、

金融创新、人力创新、管理创新为引擎。晋商将儒家“义利观”转化为商业规则，用文化赋能商业，方成“一代商雄”。

拓迹艺术是“历史的复刻”。陈旭的《鸿儒博商》通过细节处墨色与肌理的精微处理，更保留了木质匾额的沧桑质感。而将静态拓片创新性转化为动态街景，则赋予沉睡文物以直观的历史叙事生命力。

——以街景为镜，映照晋商“儒商合一”的独特生态；
——以书山为梯，诠释其“以勤为径、以文铸魂”的成功密码；

——以巨幅长卷的史诗感，将晋商精神升华为中华商业文明的一座丰碑。

作品《鸿儒博商》原件均来自晋商遗存，材质本身已成历史证人。而陈旭以当代构图重组它们，不仅是对晋商历史的一次深度致敬，更在全球化语境下全新定位并具体呈现了中国商道传承的文化根脉，为当代商业社会提供了“义利兼济”的精神航标。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人物简介

陈旭，高级经济师，陈旭拓迹艺术博物馆馆长、山西省思贤书院副院长、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收藏家协会顾问、太原市非遗文化促进会顾问，山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及金融学院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古典金融创新研究者、晋商研究者、古籍及史料收藏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拓迹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带头人；被授予晋阳工匠、山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抗战武器太原造

王 荣

抗战时期的太原兵工厂曾仿制多款枪械，如晋造十七式手枪、晋造十七式冲锋枪、晋造六五式步枪和晋造三八式重机枪，虽因条件所限，没能达到原版枪械的制造水平，但在抗战中依旧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晋绥军和八路军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武器。

晋造十七式手枪

晋造十七式手枪是太原兵工厂于1928年生产的一款武器，由于这一年是民国十七年，因此被称为晋造十七式手枪。该手枪仿制自德国的毛瑟C96手枪，使用10发固定式弹仓，发射.45ACP子弹。

由于.45ACP弹药体积较大，再加上10发的弹容量，手枪的弹仓部分就显得较宽且长了，因此可以从外观上一眼认出它与原版毛瑟C96手枪的区别。

太原兵工厂生产的这款仿制手枪成为国内第一款大口径手枪，广泛装备了晋绥军和山西地区的八路军将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其大口径和宽大的外形，还得到了“大眼匣子”与“大号匣子”的绰号。

晋造十七式冲锋枪

除了手枪，太原兵工厂在1928年还仿制了美国的汤姆逊M1921型冲锋枪，并将其命名为晋造十七式冲锋枪。这款冲锋枪同样使用.45ACP弹药，也称11.43毫米弹药。由于冲锋枪射速快，为了节省子弹，通常使用20发弹匣供弹。

晋造十七式冲锋枪与汤姆逊M1921型冲锋枪在外形和结构上非常相似，每分钟射速达900发，有效射程200米。为了表明是太原兵工厂的产品，枪身上刻有兵工厂的钢印。

在抗日战争中，晋造十七式冲锋枪装备了晋绥军和八路军部队，凭借其强大的火力和快速射击能力，也被称为“晋造十七式冲锋机关枪”。另外，这款枪械还有多个外号，如“晋造汤姆逊”和“晋造冲锋枪”。

晋造六五式步枪

日本的“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在中国影响深远，凭借其出色的可靠性和6.5毫米小后坐力子弹，成为当时常用的武器。太原兵工厂在1924年仿制了三八式步枪，并将其命名为晋造六五式步枪，发射相同的6.5毫米弹药。

晋造六五式步枪包括标准型和卡宾型（一般指为方便携带而进行轻量化或枪管缩短的型号），标准型几乎与原版三八式一致，长度1275毫米，重量3.95千克。卡宾型则更为紧凑，全长仅965毫米，适合骑兵、炮兵和工兵使用。这款步枪在1924年至1930年间生产了约20万支，在抗日战争中装备了部分晋绥军和八路军部队，因其与日军步枪口径相同，弹药供应较为方便。

晋造三八式重机枪

太原兵工厂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仿制了日本的明治三八式重机枪，并命名为晋造三八式重机枪。虽然日本重机枪和太原兵工厂的版本都是法国哈齐开斯重机枪的仿制品，但基本性能相似，发射6.5毫米弹药，供弹采用30发保弹板。

这款重机枪射速较慢，理论射速约450发/分钟，最大射程达4000米。在抗日战争中，晋造三八式重机枪被少量装备于八路军，成为对抗日寇的重要武器。



八路军战士马晓春使用过的军刀（山西革命军事馆藏）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一定对这一幕印象深刻：“骑兵连，进攻！”随着一声令下，骑兵们齐举军刀勇猛冲杀。一把军刀，犹见骑兵当年勇。

位于杏花岭区新民北街1号的山西革命军事馆中，有一把征集而来的军刀，其主人是八路军129师386旅骑兵连战士马晓春。

“这是一把缴获的日式军刀，它既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也是民族抗争的见证。”捐赠人韩虎则老人讲述这把军刀背后的故事时说。

1943年5月，目睹家园焚毁、亲人罹难，长子县石哲镇张家庄村村民马晓春毅然参军，投身八路军。这一年，他刚满18岁。因英勇善战，马晓春很快被选入129师386旅骑兵连。抗日战场上，骑兵们凭借优越的机动性，经常利用夜色突袭日军据点，破坏敌指挥系统，并多次剿灭匪患、掩护指挥机关转移。这把军刀就是他们缴获的战利品。

班长将军刀交给了马晓春，并嘱咐：“一定要用它多杀敌人！”此后，这把军刀跟随马晓春转战华北大地，参加了1944年的攻势作战和1945年的全面反攻。在一次激烈拼杀中，军刀留下了道道缺口，成为那段金戈铁马岁月的重要见证。

1951年，马晓春退伍返乡，经组织批准，他将军刀作为最重要的“战友”带回了家，并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1985年，无儿无女的马晓春入住长子县光荣院，他将军刀也带了过去，甚至晚上睡觉时也要放在床上，仿佛随时准备响应冲锋的号角。这份特殊的“执念”，引起了时任光荣院院长韩虎则的注意。“得知马老是老八路，我特别高兴，连着四五天找他聊天。谈起当年战场，他的眼中就闪烁着异样的神采。”韩虎则说，自己是一名八路军后代，对八路军有着特殊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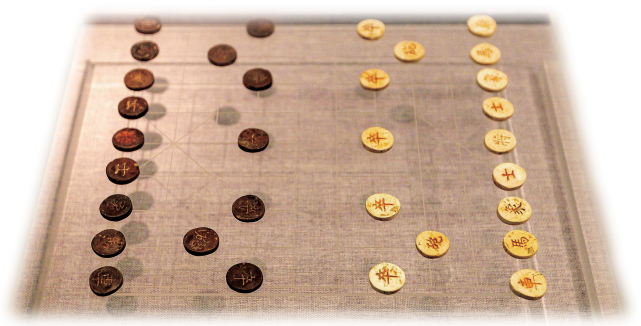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忘年交。1994年，马晓春临终前将珍藏半生的军刀托付给了韩虎则。当时，韩虎则已担任长子县北高庙烈士陵园负责人。马晓春希望将军刀放在陵园展馆里，让更多人记住八路军骑兵的英勇，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多年来，韩虎则陆续收集了一些八路军臂章、书信文件、生活用品等，一起陈列在陵园展馆里。得知山西革命军事馆正在征集文物后，他捐献了这把军刀。

闫宏刚 李浩然

犹见骑兵当年勇

瓷胎象棋

钩 希



宋代瓷胎象棋（洛阳博物馆藏）

“马走日，象飞田”，即使不是象棋爱好者，也能说上两句这样的顺口溜。在洛阳博物馆的展柜里，摆放着北宋年间的一副象棋，黑、白棋子各16枚，共计32枚，虽历经近千年时光，依然保存完好。

这些棋子以瓷土烧制，素面无釉，直径仅约1.8厘米，厚约0.5厘米，相较于现代象棋更为纤薄。每枚棋子正面阴刻文字，再填涂朱砂。虽因年代久远导致部分朱色褪去，但通过刻痕，仍可以辨认棋子的“角色”。

细看这些棋子，就会发现有“卒”无“兵”，有“将”无“帅”，而“炮”也非火字旁，而是石字旁的“礲”。当时，火炮还没有发明出来，“礲”是指利用杠杆抛石的“砲车”，也就是投石机。

宋代象棋之盛，超乎今人想象。洪遵在《谱双》中记载“象棋家喻户晓”，临安（今杭州）街巷遍布制作棋具的工匠，市井随处可购。更令人惊叹的是职业棋手的地位——皇宫特设“棋待诏”官职，专陪皇帝对弈。周密《武林旧事》所列十位“棋待诏”中，竟有一位名唤沈姑姑的女子，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留名的女国手。

一则造字轶事

郭悦

在山西自然博物馆中，一块普通的石灰岩被放在展柜中的一角。仔细观察，这块采自于西藏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石灰岩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螺旋状的纹路，正是蜉科化石。

“蜉”这个字的出现，与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息息相关。

1920年，李四光带领学生踏勘华北煤田时，发现含煤地层的年代划分存在巨大争议。一种形如纺锤的微体古生物化石成为破题关键——它在西方学界称为“fusulinid”（源自拉丁文“纺锤”），日本学者将其译为“纺锤虫”。但李四光认为此名不妥：这种生物是原生生物，纺锤虫的说法，虽然形象，但称其为虫，无异于是指鹿为马。

他联想到中国民间称纺锤为“筴”，遂起名“筴蛸”。在他看来，“筴蛸”这一名既符合原意，也十分形象。

蜉是一类灭绝于2.5亿年前的单细胞海洋生物，壳体通常仅米粒大小，形似纺锤。其化石遍布全球，在中国北方的石炭纪、二叠纪地层中十分常见。李四光看中蜉的独特价值：不同种属生存时代明确，是划分地层的“地质时钟”。含煤地层与蜉的生存年代高度重叠，通过鉴定蜉化石，可精准确定煤层地质年代，指导煤炭勘探。

1923年，李四光发表《筴蛸鉴定法》，首创蜉科鉴定的十条标准，将定量分析引入化石研究。他提出以“旋脊高度”“隔壁褶皱强度”等指标，取代模糊的文字描述。四年后，在他出版的专著《中国北部之蜉科》中，他在“筴”字左侧加“虫”旁，造出新字“蜉”，取义“筴状之虫”。这本书将华北含煤地层“太原系”细分为本溪系（中石炭世，约3.1亿年前）和山西系（下二叠世，约2.9亿年前）。这一划分平息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北部煤层年代的长期争论，甚至影响了北美地层研究。

“蜉”字诞生于汉字创新的黄金时代。刘半农1918年创“她”字为女性确立文字标识，蔡方荫1953年造“砼”代“混凝土”以利工程速记。李四光的“蜉”字虽专业性强，却成为中国科学家自主命名权的象征之一。